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功利主义

[英] 约翰·穆勒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功利主义

[英] 约翰·穆勒 著

徐大建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功利主义/(英)约翰·穆勒著;徐大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哲学)
ISBN 978-7-100-13459-0

I. ①功… II. ①约… ②徐… III. ①功利主义—研究 IV. ①B8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876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功利主义

[英]约翰·穆勒 著
徐大建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459-0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½ 插页 1

定价:15.00元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in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约翰·穆勒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译者序

《功利主义》是 19 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撰写的一本伦理学名著,最初于 1861 年发表在《弗雷泽杂志》上,1863 年始以单行本出版。

穆勒的著作对于英国人的思想来说,曾经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①并且这种影响由于传统而一直延续至今。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穆勒也不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名字。早在晚清末年,他的政治学名著《论自由》(初版于 1859 年)和方法论名著《逻辑学体系》(初版于 1843 年),就已被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两书,于 20 世纪初介绍给了中国的思想界,对中国的近现代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穆勒的其他主要著作,如《政治经济学原理》(初版于 1848 年)、《代议制政府》(初版于 1861 年)以及《功利主义》,也先后被译成中文,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都被收入了《汉译世界名著》,对中国的思想界也具有相当的影响。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国际中文版,第 11 卷,第 201 页。



除了学术上的影响之外，穆勒更能引起一般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一点也许是，他是西方教育史上少见的早期教育的成功典范之一。穆勒不同于与他一脉相承的大多数英国前辈和同辈如洛克、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马尔萨斯等人的一点是，这些人几乎全都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出身于英国名牌大学，而穆勒则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更没上过大学，他的全部教育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

在父亲的教育下，穆勒3岁开始学习古希腊文，8岁开始学习拉丁文、欧几里得几何学和代数学，12岁时开始攻读经院逻辑学，13岁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攻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14至15岁学习了化学和植物学，探讨了高深的数学问题，并已把法语学得十分精通。据他自己说，他虽然在天赋上并不比别人聪明，但在父亲严格的早期教育下，他在智力上大约比同龄人早熟了25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穆勒尽管从17岁就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直至52岁退休，整整工作了35年，与此同时却利用业余时间做出了大多数专业人员一辈子都做不出来的学问！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功利主义》，奠定了穆勒作为近现代功利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在伦理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本书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唐铎先生的中译本，并在1957年作了再版，但这个译本毕竟已有了70余年的历史，其文字表达已不太符合现在的汉语规范，考虑到读者的需要，笔者觉得有重译的必要。

在笔者看来，作为一本伦理学名著，穆勒的《功利主义》之所以值得每个伦理学研究者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仔细研读，有两个基本的理由。其一，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真正的现代思想，其精神已



经渗入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起着任何一个学派都不能比拟的巨大影响,任何一个想要对现代西方文明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能不对功利主义有所了解。其二,穆勒的这本《功利主义》,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不仅对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相当完备而又清楚明白的阐明,而且对伦理学的一些根本问题都作了功利主义的说明。下面笔者打算就穆勒功利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前承后继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一

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主流是自由主义,而在自由主义的内部,一般认为又可分为三大派别,即自由平等主义、自由至上主义与功利主义。不过在笔者看来,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最有影响的思想流派只有两个,一个是发源于古代自然法学派的契约论学派,而另一个就是功利主义学派。

当代自由主义契约论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或制度应当符合正义的原则,而所谓正义,简要地说就是尊重或者不侵犯个人的基本人权。如果要问其理由或根据,那么这个学派的基本方法论依据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会一致同意这一点,或者人的天启理性会告诉你这一点;换言之,因为人的理性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诉诸每个人的同意,而诉诸人们的一致同意差不多也就相当于诉诸人的理性。如果再要追根究底,那么还可以顺着天启理性追溯到自然法或上帝那儿。

这个学派的当代杰出代表是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而



其近代的先驱则可追溯到洛克、康德等人。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明确地表示：

我一直试图作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借此，我希望能把这种理论发展得能经受住那些常常被认为对它是致命的明显攻击。而且，这一理论看来提供了一种对正义的系统解释，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不仅可以替换，而且或许还优于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功利主义解释。……确实，我并不认为我提出的观点具有创始性，相反我承认其中主要的观念都是传统的和众所周知的。我的意图是要通过某些简化的手段把它们组织成一个一般的体系，以使它们的丰富内涵能被人们赏识。^①

的确，罗尔斯撰写的《正义论》的基本观点并没有超越洛克等人的天赋人权理论，^②不过，他通过引入“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所构造的原初状态并引入“最低收入最大化原则”(maximin principle)所构造的社会契约论，比起洛克等人直接诉诸天启理性的社会契约论，其论证要精致得多，因此也少了一些神秘性而比较符合现代的论证。

^①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 页。

^② 参阅：徐大建，《社会公平、和谐与经济效率》，《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

相对于自由主义契约论学派而言,功利主义学派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对当代的人类思想具有更大的影响,正如罗尔斯所说:

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功利主义一直得到一系列创立过某些确实富有影响和魅力的思想流派的杰出作家们的支持。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伟大的功利主义者像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穆勒也是第一流的社会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所确立的道德理论旨在满足他们更广泛的兴趣和适应一种内容广泛的体系。而那些批评他们的人则常常站在一种狭窄得多的立场上。他们指出了功利主义的模糊性,注意到它的许多推断与我们的道德情感之间的明显的不一致。但我相信,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种能与之抗衡的实用的和系统的道德观。结果,我们常常看来不得不在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很可能停留在某一功利主义的变种上,这一变种在某些特殊方面又受到直觉主义的修正和限定。^①

功利主义之所以对当代的人类思想具有更大的影响,不仅是因为其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极其简单,并且符合常人的理性——合乎道德的行为或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更

^①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主要的是因为,通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或表述,如“公众幸福”、“社会功利”、“社会繁荣”乃至表示“效率”的各种标准如“帕雷托最优”、“GDP”、“生产可能性边界”等等,功利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构造了一种足以与自由主义契约论学派相抗衡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而且在经济领域排除了所有其他的伦理学说而独自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伦理框架。我们或许可以说,在现有的伦理学说中,功利主义是唯一能够奠定各门社会科学的伦理基础,从而为它们指明方向的伦理学说。

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功利主义之所以比自由主义契约论学派更有影响,还因为功利主义的论证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较之为了追求某种绝对真理而诉诸人的天启理性的唯理论认识论来说,更加合理,也更具现代性。

在古代西方,占优势的伦理学论证是所谓自然法学派的论证,其大意是,人类行为规则的根据来自上帝颁布的自然法,由天启理性得到;尽管现有的许多行为规则属于人类法,是人制定的,但它们的最终依据是自然法,是自然法根据具体现实情况的某种应用。这样的论证不免使得被自然法认可的一切都带有某种神秘性乃至神圣性。

到了近现代,由于自然科学和经验主义认识论学派的兴起,宗教的权威开始下降,便为功利主义学派在伦理学和社会科学之中的兴起扫除了信仰的障碍并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一切知识的取舍最后都要诉诸人的日常经验而不是诉诸人的理性或上帝,伦理道德的论证也不例外。在近代功利主义兴起的过程中,18世纪英



国的苏格兰学派起了开创性的作用,而赋予其完备形式的人则是边沁与穆勒。

苏格兰学派的核心人物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将培根和洛克开创的经验论认识论发展到了首尾一贯的怀疑论,对自然法学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休谟看来,自然法学派为了追求绝对真的法则所诉诸的“理性”,其实包含着三种不同的含义。其第一种含义是指对观念之间必然联系的认知,它与经验无关,所以具有绝对真的性质,但这种性质仅存在于逻辑和数学这样的同义反复的命题之中;其第二种含义是指对事物的经验性因果关系的认识,但这种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必然性,而仅仅是心理习惯而已;其第三种含义则是指对正确的人类行为规则——特别是诸如权利、正义或自由之类的理性原则——的把握,但这些所谓的理性原则其实不过反映了人们的趣味或情感,而并非理性的东西。^① 所以,自然法学派所宣称的出于理性的自然法原则,其实不过是由经验根据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公众利益的结果判断为正当的行为标准,实质上是人类情感、心理习惯和社会习俗的混合物,而非出自自然的永恒真理。

根据这种革命性的经验论认识论,休谟一方面从经验上承认财产权、契约义务及其他各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定,另一方面又推翻了它们的理论基础自然法,包括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自明真理、永恒不变的道德法等等,否定了被人们视为必然、神圣、

^① 参阅: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1—153页。



彼岸、永恒的一切，而只从心理联想和社会习俗的角度，并根据社会功利这种唯一的情感因素来解释上述各种道德、政治与法律的规定：“正义之所以得到赞许，确实只是为了它有促进公益的倾向”。^① 休谟的这些论证为功利主义奠定了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础。

苏格兰学派的另一主要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公认的经济学家创始人，也是休谟的好朋友。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扬了功利主义的精神。斯密的基本理论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第一，人的全部行为基础是一种双重性的天赋人性——人人都同时具有自利心和同情心；第二，经济行为的目的应当是个人的自由自主的幸福生活及其必要条件国民财富的增长或社会财富最大化；第三，在这样的人性基础上，为了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的，基本的途径应当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及严格保护财产权利和契约义务的政治制度。他的功利主义精神表现在，一方面，他用经济学的语言“国民财富最大化”解释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终极目的；另一方面，他说明了如何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上达到功利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即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学奠定了功利主义的伦理框架。

在苏格兰学派理论的基础上，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首次对近现代功利主义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阐述。边沁认为，感觉经验是包括道德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的最根本而又真实

^①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662 页。

的基础,因此,伦理道德也不能不建立在为人类经验所认可的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和自我利益的追求之基础上:“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①当每个人都真正得到了自己的最大利益时,社会也就达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最大幸福原理”依赖于每个人的最大幸福之加总。于是,功利主义道德基本上就在于苦乐的计算。在边沁的理论中,开明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是一致的。

边沁把功利主义用于政治和立法理论,同样否定了社会契约、自然权利、自然法等抽象的假定,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违反经验事实的虚构和幻想,不能用来解释国家和政治的基础和产生的根源。国家的产生完全是人们出于功利考虑的结果,国家与政府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功利。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要从多数人的幸福出发。法律理论应当侧重于法律规范和惩罚的实际效率、效用和收益。所以,边沁的功利主义政治法律哲学虽然属于激进的自由主义,积极追求平等、自由、人道,但其理论基础已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而以经验主义为出发点,在当时极具革命性。

总之,功利主义道德在精神上是不同于西方传统道德的。西方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在上帝信仰之上的克己和利他,是与追求个人利益相对立的。而功利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则在于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在于与个人利益的一致;这种利益,可以称之为幸福,也可以称之为价值,可以称之为有用,也可称之为

^①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1页。



效用,它建立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各种目的或目标之上,没有任何虚无缥缈和神圣之处。

二

穆勒在上述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撰写的《功利主义》一书,共分五章,除了第一章导论之外,其余四章分别从伦理学的四个重要问题着手,对功利主义作了经典的说明。下面我们分别对本书所论的四方面问题作一简要的提炼。

1. 本书首先以“功利主义的含义”为题,对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了全面的澄清。

(1)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穆勒给出了功利主义的经典答案:

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唯有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值得欲求的目的,所有值得欲求的东西(它们在功利主义理论中与在其他任何理论中一样为数众多)之所以值得欲求,或者是因为内在于它们之中的快乐,或者是因为它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①

① 见本书第8—9页。

